

——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

邢向东 主编

吴堡方言调查研究

邢向东 王兆富 著

中華書局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0409)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邢向东 主编

吴堡方言调查研究

邢向东 王兆富◎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堡方言调查研究/邢向东,王兆富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5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邢向东主编)

ISBN 978-7-101-09994-2

I. 吴… II. ①邢…②王… III. 西北方言-调查研究-吴堡县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6137号

书 名 吴堡方言调查研究

著 者 邢向东 王兆富

丛 书 名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丛书主编 邢向东

责任编辑 张 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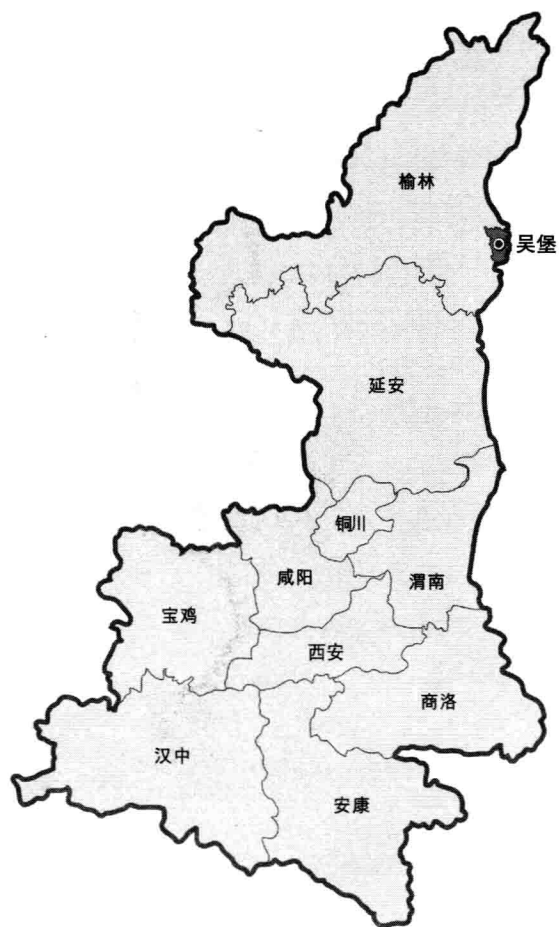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frac{3}{4}$ 插页3 字数39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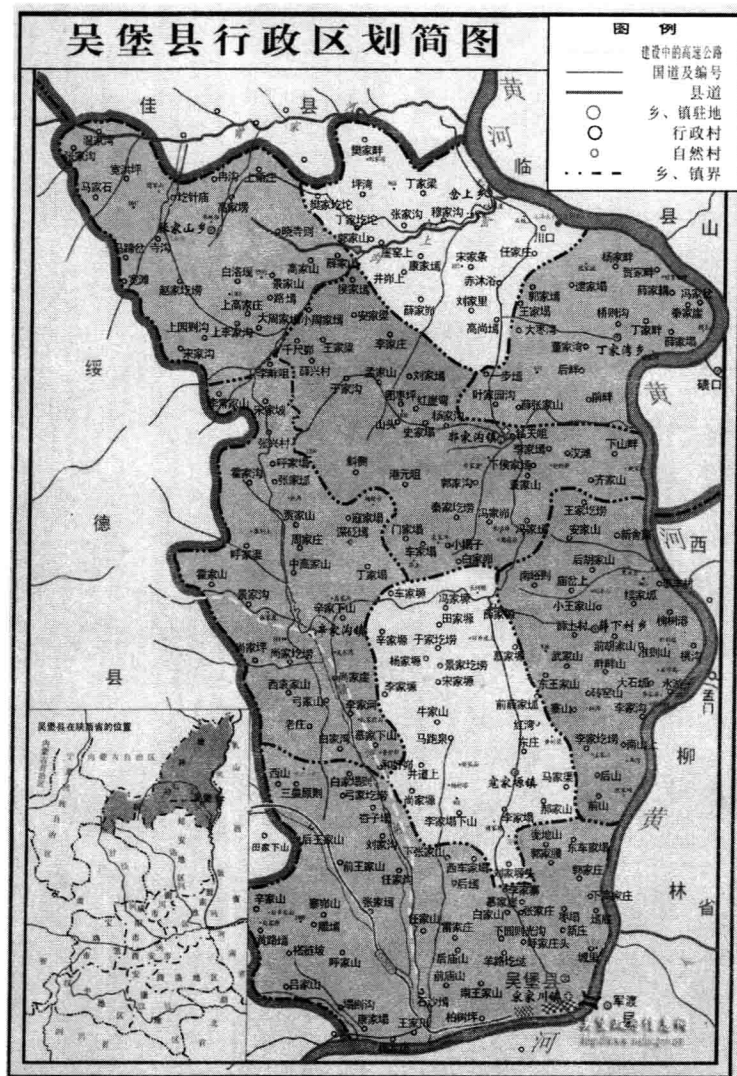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994-2

定 价 48.00元



吴堡县在陕西省的位置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1100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还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某些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

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是要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内容有:(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

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还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我们希望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内容有:(1)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

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这些遗产进行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又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

生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序

最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先详后略地读了《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的第一部《平利方言调查研究》(初稿)。书稿很长,洋洋数十万言,从地理历史人口到移民和方言形成,从语音到词汇语法再到语料记音,从平面描写到共时、历时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平利方言的全貌,丰富而鲜活的语料揭示出这个处于江淮、西南、中原三个官话地区之交的方言错综复杂的情况。平利这个混合型方言的许多特点,诸如亲属称谓、词缀、语气词的兼收并蓄,动词体貌的多种表现形式,特色明显的补语及其多种格式,等等,都使我开了眼界,受益良多。下面只说其中语音的一项。

平利方言见晓组声母逢合口细音与知庄章合口字(包括少量开口字)合并,读为舌尖后音 $t\dot{\varsigma}$ $t\dot{\varsigma}^n$ $\dot{\varsigma}$,韵母或介音是 u 。平利方言的 u 类韵母共有8个,如下表:

	例字	读音	例字	读音	例字	读音	例字	读音
知庄章	主章	$\text{t}\dot{\varsigma}\text{u}$	耍生	$\text{t}\dot{\varsigma}\text{ua}$	说书	$\text{t}\dot{\varsigma}\text{ue}$	拽崇	$\text{t}\dot{\varsigma}\text{uai}^3$
见晓	举见		(见晓组无字)		靴晓		(见晓组无字)	
知庄章	追知	$\text{t}\dot{\varsigma}\text{uei}$	喘昌	$\text{t}\dot{\varsigma}^h\text{uan}$	唇船	$\text{t}\dot{\varsigma}^h\text{uən}$	庄庄	$\text{t}\dot{\varsigma}\text{uan}$
见晓	(见晓组无字)		犬溪		裙群		(见晓组无字)	

中古知庄章声母的一些合口字与见晓组合口三、四等字(今北京读撮口呼)同音,在汉语中除江淮官话黄孝片以外,还分布在其他的方言区,如湘语(长沙)、赣语(南昌)等方言。但是这种音类的合并从音值看则有不同的走向:长沙等大多是知庄章向见晓组靠拢读为舌面音(或舌根音),而平利方言则是见晓组向知庄章靠拢读为卷舌音。这种不同也存在于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内部,看下表的比较:

	居	诸	虚	书	靴	说	杈	船	群	唇
英山	˧tɕʊ		˧ɕʊ		˧ɕʊɛ		˧tɕʰʊan		˧tɕʰʊən	
红安	˧kʊ		˧ɕʊ		˧ɕʊɛ	˧ɕʊæ	˧kʰʊan		˧kʰʊən	
武汉	˧tɕy		˧ɕy		˧ɕye	˧sʊɻ	˧tɕʰyen	˧tɕʰyn	˧ɕyn	
通山	˧tɕy		˧ɕy		˧ɕiɔ	˧ɕyɛ	˧tɕyẽ	˧tɕyən	˧ɕyən	

可以看出,平利跟英山一致,是见晓组向知庄章靠拢读卷舌音的一种,这在汉语方言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平利方言在音类的合并方面另外还有独特的地方,即部分精组合口三等字文读也归舌尖后声母拼ɕ类韵母(白读为舌面前拼齐齿呼)。例如:

娶娶清 ˧tɕʰɕ文 ˧tɕʰi白 俗邪,风俗 ˧ɕʊ文 ˧ci白

绝从 ˧tɕʊɛ 旋邪,凯旋 ˧ɕʊan

旬巡循邪 ˧ɕʊən文 ˧cin白 迅心 ˧ɕʊən²文 ˧cin²白

这样,平利方言舌尖后拼ɕ类韵母的字来源有三:知庄章合口,见系合口三、四等,精组合口三等文读,就有例如以下几组字的同音或同声韵母:

驻知 = 句见 = 聚从 ˧tɕʊ² 出昌 = 曲溪 = 蛆清、文 ˧tɕʰɕ

术述船 = 旭晓 = 序叙邪,文 ˧ɕʊ² 植晓 = 潮生 = 铍邪,文 ˧ɕʊan²

ⁱ准章 = 均见 = 俊骏精 ˧tɕʊən 顺船 = 训晓 = 询荀邪,文 ˧ɕʊən

以上现象涉及平利方言尖团分混的复杂情况:第一,就开口细音来说,平利方言不分尖团;部分精组合口字文读与见系合口

同音,表现了跟开口字一样的不分尖团的特色。第二,精组合口细音的白读为齐齿呼,跟精见组开口细音相同而跟见组合口不同。这种关系见下表:

古音系	精开细	见开细	精合细	见合细	精开细	见开细	精合细	见合细
例字	妻	欺	蛆	去	夕	吸	俗	虚
精合文	tɕ ^h i		tɕ ^h ɿ		ɕi		ɕɿ	
精合白	tɕ ^h i			tɕ ^h i [˥]	ɕi			ɕɿ

每一种汉语方言都因其自身的各种因素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陕西省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陕西的长安(今西安)曾是我国历史上长期的政治中心,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方言是早期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研究现代共同语官话方言的形成历史,不能将陕西方言弃之不顾。同时,陕西境内所分布的方言种类繁多,特色显著,特别是像平利这样离中心城市较远的经济未开发的地区,蕴藏着大量的方言资源,急需记录整理予以保存。

《平利方言调查研究》又一次使我感慨汉语方言的丰富奇妙,使我对陕西省方言研究的意义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真切的认识。当然,陕西的同行比我的认识深切得多,近一二十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陕西方言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成果喜人,令人称羡。综合性的描写和研究成果如:刘育林《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1990)、宋文程和张维佳主编《陕西方言与普通话》(1993)、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张崇主编《陕西方言词汇集》(2007);单点的调查报告如:张成材《商县方言志》(1990)、孙立新《户县方言研究》(2001)和《西安方言研究》(2007)、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2002)、毋效智《扶风方言》(2005),等等。这为陕西方言的进一步开发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向东不失时机地确定将《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作为下一步的研究课题,计划对陕西境内的10个点进行重点调查研究。研究方言的人都知道:方言研究的基础是调查,没有调查就谈不上研究;就调查来说,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点,没有点的调查,也就谈不上片的比较。《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正是要从基础的点的实地调查做起,在强调充分调查描写方言事实、全面收集语料的基础上,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比较中,加强解释和理论的探讨,旨在突破通常“方言志丛书”和“方言研究丛书”的格局,以达到调查和研究相得益彰的效果。针对以往综合性的方言单点调查研究偏重语音而语法相对薄弱的情况,本丛书有意加强语法研究,力求挖掘虚词、时体系统等深层次的内容。

先期的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首先在点的选择上照顾到分布于陕西境内陕北、关中、陕南三区,注意到人员的配备,能够保证计划的完成,也注意从中培养锻炼方言的研究人员。在内容上以《神木方言研究》为蓝本,制定了十分详细的统一的写作大纲,并经过课题组成员集体讨论,达成共识,让每一位参加研究的人员对于调查研究内容心中有数,能够有本可循、有法可依,但也可以按照方言的具体内容而有所变通。这就保证了将来的成果既能进行统一的比较研究,又能妥善保存某些方言点的特殊资料。这些,都将对陕西方言研究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代表陕南地区的《平利方言调查研究》之外,我还看过分别代表陕北、关中两个地区的《吴堡方言调查研究》“文白异读和语音层次”一节(定稿)和《合阳方言调查研究》(初稿)的大部分章节,总的印象是调查的材料全面丰富,分析到位,有理论深度。这使我对向东胜利完成《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满怀信心,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陕西方言五彩

缤纷的语言世界。

肩负这套丛书主编的重任,我深知其中的诸多甘苦,所要付出的心血可以想见。看到向东迈开了他“大展鸿图”的坚实的步伐,我很高兴。向东,祝你成功!

钱曾怡

2008年7月22日写于山东大学

2008年8月20日改定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前言

陕西省按照自然地理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就方言来说,陕北有古老的晋语,关中有曾经作为共同语重要基础的关中话,陕南有多种方言并存,堪称方言调查研究的富矿。

陕北方言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方言,其中有19个县市区方言保留入声韵和入声调,属于晋语。陕北方言词汇中有许多古语的遗存和特征性词语,如:冻(阴平,冰)、梢(树枝)、平斤(簪子)、衿(系)、炕(把东西放在炉盖、锅底等地方,用慢火炙干)、植[tʂəʔ₂](庄稼种得早,又指人的生月早)、稗[tʂɿ²](庄稼种得晚,又指人的生月晚)、宸[ɛʂən](住)、钞(用筷子、羹匙取食)、炮(熄灭)、脑(阳平,头)、猴(小)、烧(去声,霞)、照(看)、教(让、允许)等^①。语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如:存在表过去时、将来时、现在时的完整的时制系统;有极其丰富的表达虚拟语气的助词。

陕北晋语分别属于晋语五台片、大包片、吕梁片和志延片。

^① 见刘勋宁《现代汉语研究》101—108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13—14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语音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入声的有无是将晋语与周边方言分开的鉴别标准,其中府谷、神木、吴堡等保留最完整,绥德、榆林、佳县、清涧等次之,延安(宝塔区)、延川、甘泉三县区最少,只在口语中保留部分入声字。陕北晋语中,沿黄河一带的方言存在复杂的文白异读,吴堡、清涧话最难懂。绥德话最有权威,对其他陕北话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可以说是“陕北的普通话”。处于晋语和中原官话过渡地带的延安、甘泉等方言,有许多过渡方言的特点,值得进行“地毯式”的细致考察。

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在汉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周代,“雅言的基础应该是王畿成周一带的方言”^①。现在多数人认为雅言的标准音是河洛语音,但关中地区作为西周的京畿所在,其方言当属雅言基础方言的一部分。汉代,今关中地区的方言与晋南话合称“秦晋方言”,是非常强势的方言。周祖谟先生认为“汉代的普通语恐怕是以秦晋语为主的”^②。唐代的长安话尽管可能不是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也应是共同语基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从唐宋西北方言和现代西北方言、山西方言研究的成果来看,那时的关中方言,大概属于范围广大的“西北方言”。历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其他地区人口大规模迁移入境,长安及关中地区的居民变动很大,现在的关中方言和汉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1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② 见周祖谟《方言校笺》10—11页,中华书局1993年。对这一点还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如李新魁、郑张尚芳、何九盈认为,汉代通语的标准音应当是河洛音。

③ 李新魁、郑张尚芳、何九盈等先生认为,唐代标准音为河洛一带方音,笔者赞同此说。见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又载《李新魁自选集》150—167页,大象出版社1993年;郑张尚芳《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何九盈《汉语三论》160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